

明清时期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特征及其演变

吕海平¹, 陈兴^{1,2}

(1.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8; 2.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建筑与规划系, 辽宁 沈阳 110167)

摘要:庙学建筑群作为古代地方城市祭孔与教学的建筑载体,其建筑布局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下逐渐形成定式。而辽东庙学由于地处边陲,当地特殊的社会背景、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使得辽东庙学布局在明代以后走出了一条与中原文庙截然不同的道路。以明清时期的辽东庙学建筑群为研究对象,将其布局特色进行分期研究。指出了明清两代辽东庙学建筑群的布局先后经历了初创期的简练、中期的模数化组合以及晚期的多样化3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其演变成因,对辽东地区建筑史学研究及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辽东庙学建筑;布局特征;模数化;演变成因

中图分类号:TU-092.9 **文献标志码:**A

一、庙学建筑及其在辽东地区的发展

庙学建筑群是以孔庙、学宫为代表的城市文教类建筑的总称。自唐代“庙学合一”体制形成以后,庙学建筑群一直是地方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孔庙是祭孔的精神场所、学宫的信仰中心;而学宫则是地方教学与教育行政的建筑载体。两者在空间上相互毗邻,在功能上相互依存,共同成为集科举、地方教学与尊孔崇儒于一体的文化类建筑群。我国辽东地区的庙学建筑群自辽代开始普及,从《全辽文》以及近年出土的《黄龙府府学碑文》等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京道的文庙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其建筑布局基本照搬了中原文庙的正统做法。而在经历了元代近百年的衰落期之后,边疆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与气候条件对文庙的影响逐渐加深。到了明代,辽东文庙在建筑组成、平面布局以及院落空间等方面均展现出了与中原

文庙截然不同的风貌。笔者以明清时期的庙学建筑群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3个主要的时间框架下进行研究,以连贯的视角对明清辽东庙学建筑群的演变过程及其空间布局特色进行综合分析。

二、明清时期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特征分析

1. 布局简练、功能集中的明初庙学(1368—1435年)

庙学建筑群作为地方教育教学的重要载体,在明清中原地区的城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城市中的选址与用地规模的划定,大多可以满足其各项使用要求。沈旸在《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明清以后地方孔庙的建筑等级颇高,建筑配置明显增多。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基本达到了三进院落的孔庙祭祀空间和三进院落的学宫教学空间的标准布局模式^[1]。

而明初辽东庙学则截然不同,其在用地规模和建筑规制方面均做了很大程度的简化。从《辽东志》的记载来看,辽东地区建于明宣德初年以前的文庙共有 10 座,其中辽东都司庙学为等级最高者(见图 1)。《辽东都司庙学碑记》中记载:“国朝初设都指挥使司以统诸卫,顾惟武功修而文教不可以缓也,遂于洪武辛酉命都司建学,是年都司官鸠工庀材初立学宫。越明年,壬戌建大成殿两庑戟门,戊寅重建明伦堂,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神厨、射圃,永乐壬辰始绘圣贤像,规制固已略备矣。景泰癸酉,御史谢君嫌建高阁四楹于明伦堂后。构屋二十间为诸生藏修所。天顺己卯御史田君景旸再加整葺,蠹者易之,坏者补之,漫漶者新之,焕然完好,辽东学校莫有

过焉者矣。”另有《辽东志》中对盖州卫庙学的描述:“其庙学虽初立于卫治东南,但茅屋数间,作两庑及明伦堂、斋舍、府库之用,两庑列圣贤之像。”^[2]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代表着明初辽东庙学最高规格的都司庙学,在建立之初其主体建筑也只有大成殿、两庑、戟门、明伦堂等核心建筑,其中,大成殿、两庑和戟门围合成了孔庙祭祀部分的院落空间;明伦堂与其他附属用房围合成了学宫部分的院落空间。整个庙学建筑仅由学宫和孔庙各一进院落组成(见图 2)。其余路、卫级庙学规制更加简化,从盖州卫庙学建筑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孔庙与学宫更是集中布置,整个庙学建筑群仅一进院落,明初辽东庙学规模之缩减可见一斑。



图 1 明初辽东镇庙学分布图(1368—143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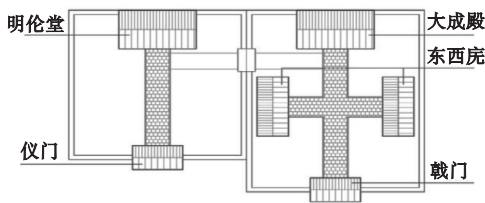


图 2 明初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复原

与此同时,庙学布局的简练必然会导致功能的集中。《辽东志》卷二建置志中对都司庙学的记载如下:“永乐壬辰,都指挥巫凯

塑先师以下像十余,供于正殿。”另有《宁远卫重修庙学记》记载:“夫子实万世斯道之宗主,颜曾思孟以下诸贤者皆有功于斯道,官家之恤祀,抱功吾人之希贤,庙以安之,貌以象之,赖可坐视其敝而不加之意。宁远虽云边地,去关不二百里,虽躬荒绝塞,亦所不略。”从以上两处对都司庙学和卫城庙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庙规模的缩小并没有带来祭祀内容的简化,而是将诸多功能集于一身,大成

殿兼具了祭祀孔子弟子和历代先贤名儒的功能。先贤祠、孝子祠等附属建筑的一部分功能也集中于正殿之中。此外,两庑的功能也更加复杂化。从《辽东志》对盖州卫庙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孔庙与学宫院落的合并,在两庑之中供奉圣像,在大成殿建成之前,一直承担着庙学的主要祭祀职能,这也许是边疆地区庙学建筑特有的布置模式。明初辽东地区布局简练、功能集中的庙学建筑以一进院的规模承担起了中原三进院庙学的完备职能,为这一时期辽东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 层次丰富、封闭性强的明中期—清中期(1436—1860年)模数化庙学

明代正统到清代咸丰年间是辽东庙学建筑群的大发展时期。从正统初年开始,辽东庙学的发展迎来转折,一方面,庙学数量明显增

多,义州卫、沈阳中卫、广宁中左屯卫等地庙学相继创建^[3],辽东庙学总数达到了14处(见图3);另一方面,明代弘治年间的兴学运动与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庙学建设热潮也使辽东庙学布局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辽东庙学规模普遍增大,空间层次更加丰富,且各院落间封闭性极强,形成了以小型庭院为基本单位的模数化平面布局。与同时期中原庙学追求空间开敞、院落宏大的趋势截然不同,形成了独特的辽东庙学风貌。清代入关以后,辽东作为其龙兴之地,庙学建筑规制未有懈怠,这一布局模式一直延续到咸丰末年东北开禁以前,占据辽东庙学布局模式的主导地位长达四百余年之久,对辽东晚清庙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图3 明中晚期辽东镇庙学分布图(1487—1644年)

据《辽东都司庙学碑记》记载:弘治初年,御史谢君嫌在明伦堂后增建三间尊经阁,以供诸生藏修之用。至此学宫部分的教学和藏书两大主要院落基本形成。孔庙祭祀部分的完备工作也在同时展开。《辽东志》卷二建置志中记载:“弘治壬子,御史宋鑑建四斋东西号房,癸丑凿泮池,戊午御史罗贤改建棂星门。”另据《宁远卫重修庙学记》记载:“弘治癸亥,御史南康余公首谒夫子庙,展拜之余

遂慨然有一新之意。倾颓者撤而新之,未备者皆增而置之。自正殿而下,东西为两庑,前为戟门、为泮池,泮池之上为桥道,最前为棂星门,门之左右各建坊扁,截然改观。由是庙貌学宫盖将完美矣。”康熙《锦州府志》载:“锦州府学,国朝康熙五年知府宋之铨建,圣殿三间因旧址重建,棂星门三楹旧置今渐圯,东西木坊二、明伦堂五间,康熙六年知府宋之铨建,崇圣祠三间,康熙七年知府宋之铨重

建,戟门、泮池俱康熙十七年知府刘源浦重建。”另有民国《沈阳县志》载:“县治儒学在城内东南隅,明时为沈阳中卫学,在卫治西北隅,清天聪三年改建今地,初建圣殿三楹及戟门、棂星门,设银爵,康熙五年增修学宫。”^[4]

从以上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经过明代中晚期的两次变革以及清初的改建之后,辽东庙学建筑组成已达到中原地区的一般标准,其平面布局从原有的一进院落发展至四进,学宫部分从原有的一进院落发展至三进。这一发展过程同时受到了辽东地形地貌以及早期庙学形态的双重影响,并最终使得辽东庙学建筑群在院落空间和平面布局两方面与中原庙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首先,在院落空间方面,不仅高级别庙学,而且各地县级庙学,如上海嘉定县、山西平遥县等庙学同样开始追求开敞的祭祀空间^[5],庙学的大成殿主祭院落规模加大,多数孔庙将两进院落间的

院墙打通,以便在最大限度上追求祭祀空间的开敞(见图4)。而辽东庙学的院落空间在这一时期依然保持着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各主体建筑两侧均连接院墙,就连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棂星门也无一不与院墙连接。这种小而封闭的院落划分在丰富空间层次的同时,有效缓解了辽东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因此在经济发达的晚清时期也依然沿用。从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多座庙学,包括明代始建的宁远州庙学、清初海城县庙学、奉天府庙学等均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见图5^[6])。清代宁远州庙学的棂星门形制虽已改为中原地区常见的牌楼形式,但其两侧依然与墙体相连,这种轻盈的建筑体量与厚重的墙体相连,在视觉上十分不协调。可见,经济的发展仅仅提高了宁远州庙学的单体建筑形制,但在空间划分上依然保留着辽东庙学固有的分割模式。



(a)上海嘉定县庙学



(b)山西平遥县庙学



(c)辽宁铁岭县庙学

图4 辽东与中原地区县级庙学大成殿院落空间比较



(a)奉天府庙学



(b)海城县庙学



(c)宁远州庙学

图5 辽东各级庙学的封闭型院落空间

与此同时,这种封闭性极强的庙学空间使其在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了显著的模数化倾向。由于早期庙学规模较小,主体院落与之后发展起来的从祭院落无法在规模上做出明确区分,各进院落规模基本相同,这与中原庙学大小各异、主次分明的院落组合形成了鲜明对比(见图6)。但其院落功能的组织与中原庙学基本一致。孔庙部分从第一进院落开

始,依次是照壁与棂星门围合成的前导空间,棂星门与大成门围合而成的引导空间,大成殿、大成门和东西庑围合而成的孔庙主体祭祀空间,最后是以祭祀圣人先祖为主要功能的院落空间,这一院落除启圣公祠(清改称崇圣祠)以外,祭器库、典籍库等仓储建筑分列左右,是整个孔庙院落部分的尾声。学宫部分的基本布局依然为明伦堂居中,前部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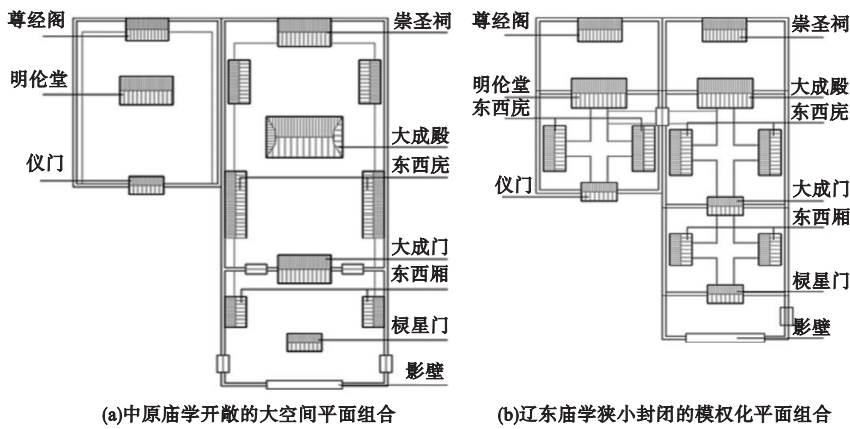


图6 明中晚期辽东庙学平面布局与中原地区常见布局模式比较

右设东厢和西厢房构成主体教学空间,堂后为尊经阁院落,堂前设儒学门和仪门两道。整个庙学建筑群各进院落虽小,但形状规整、布局严谨,反映出典型的以小空间院落为基本单位的模数化布局关系。

3. 形式多变、布局灵活的晚清庙学 (1860—1911 年)

咸丰十年(1860 年)东北地区开禁以后,辽东庙学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经济的发

展极大地推动了辽东庙学的营建。截至光绪三十年(1905 年),奉天省庙学数量已达 24 处(见图 7)。这个时期的庙学建筑群在布局上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7]。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新建庙学的布局模式趋向中原化;另一方面,部分庙学在继承传统营建模式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形成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晚清庙学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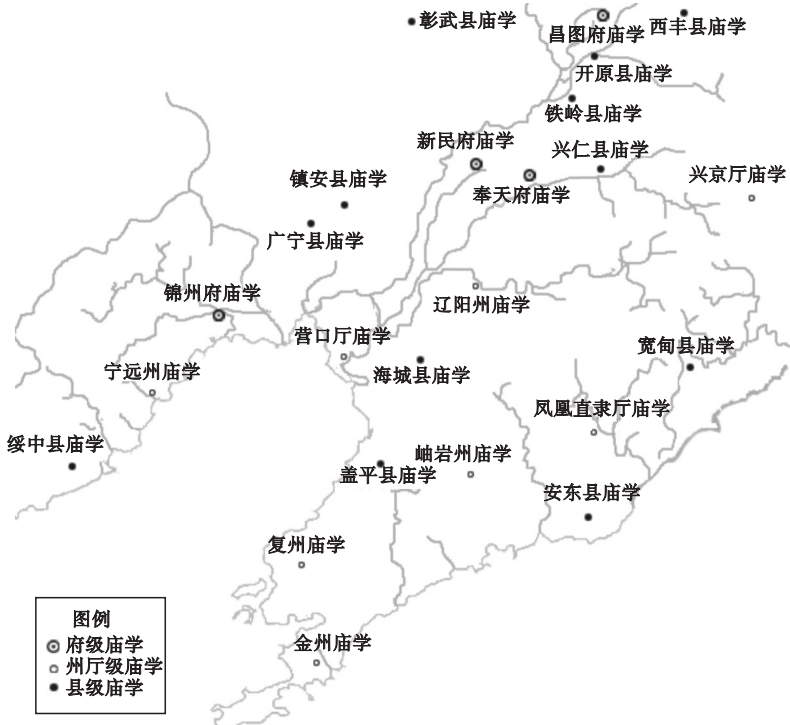


图7 清末奉天省庙学分布图(1860—1905 年)

首先,在趋向中原庙学方面,以金州庙学最为直观(见图 8)。金州庙学始建于明初,

明清之交毁于战火,清代同治年间重建。从建筑布局上看,整个庙学建筑为左庙右学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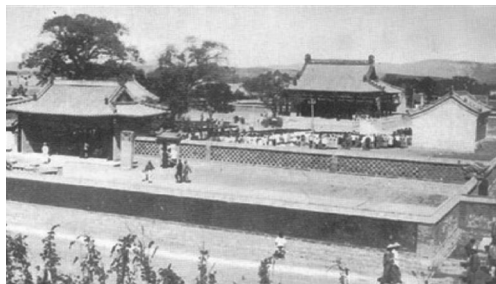


图8 金州庙学

孔庙部分规模宏大,平面布局由三进院落组成,中间院落空间开阔,与前后院落区别明显,祭祀空间收放自如,主次分明。大成殿为单层歇山顶建筑,除棂星门、大成门、崇圣祠等主体建筑外,乡贤祠等一应俱全,与中原地区庙学相差无几,凸显了清末辽东庙学之恢宏^[8]。

此外,凤凰直隶厅庙学、昌图府庙学、西丰县庙学、锦县庙学等一大批晚清庙学在继承了辽东庙学“小空间、模数化”布局的基础上,将城市文运类建筑和私学性质的书院也纳入进来。这些建筑作为城市文运的象征,在以往的中原城市中大多置于市井中心或地势较高处。清代早期辽东城市的魁星楼也多见于城墙东南角。及至晚清庙学发展的高峰期,一些县城在兴建魁星楼、文昌宫等文运建筑时,刻意将其建于庙学两侧,极大地扩展了庙学建筑群的整体规模^[9]。其中,昌图府庙学、凤凰直隶厅庙学是这类庙学的典型代表。学宫、孔庙、文昌宫、书院从西向东依次排开,传统庙学建筑群纵向延伸式的空间布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轴并列、双向拓展”的布局形式。而东南角的魁星楼则取代了棂星门,成为庙学新的标表性建筑。这种集教学、祭祀、启运于一体的新型庙学建筑综合体是清末辽东地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9)。

三、辽东庙学建筑群演变的基本轨迹及成因

纵观辽东庙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历程,有初创期的简化、明中期完备后的长期停滞,也有清代晚期的快速发展。每一个阶段无不映射出辽东庙学建筑群空间形态与布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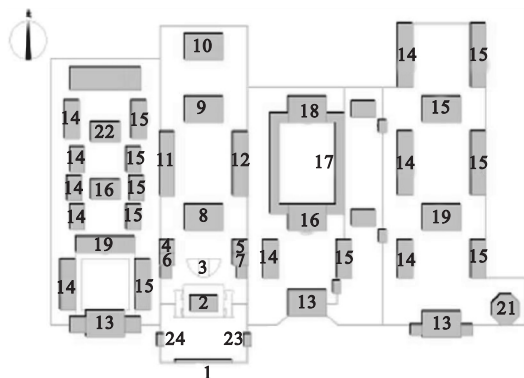


图9 凤凰直隶厅庙学建筑综合体布局复原

1. 照壁;2. 棂星门;3. 泮池泮桥;4. 名宦祠;5. 乡贤祠;6. 孝子祠;7. 节妇祠;8. 戟门;9. 大成殿;10. 崇圣殿;11. 西庑;12. 东庑;13. 门楼;14. 西配房;15. 东配房;16. 过厅;17. 东西连廊;18. 正殿;19. 前厅;20. 讲堂;21. 魁星楼;22. 明伦堂;23. 礼门;24. 义路。

的独特属性。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明清时期辽东地区特殊的城市环境、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等因素对庙学建筑群发展的深刻影响。

明代初年,辽东庙学基本是本着“小规模、重实用”的营建宗旨发展起来的。这一方面与明初辽东的城市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的边疆文化政策有着必然关系。明初辽东地区的城市按照军事防御要求划分为都司镇城、路城和卫城3个等级,担负着北御女真、西控蒙古的重要军事职能。从《辽东志》卷二建置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出于防御要求,卫城的占地规模较之中原同等级别的县一级城市稍小,而各防御卫城中的军器局、军储仓、预备仓等军事机构和大面积的校场又是优先考虑的对象^[10]。明代《辽东志》卷二建置志《都司文庙新置雅乐记》记载:“宪宗皇帝遣学士王献告于庙庭、屋舍、礼乐之增崇,两京十三省皆然也,唯辽东都司避之一隅。”在这种城市背景之下,像中原那样的大面积庙学建筑群显然没有发展的空间。此外,多民族交汇融合、汉文化影响力较弱是这一地区的普遍现象。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明太祖秉持“文以饰治、武以御辱,文武一道”的边疆文教政策,在明初辽东地区大力普及教育。这一时期的辽东庙学以“教化边民”为主要任务,其实用功能远大于祭祀

礼仪的需求。在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有限的明初,辽东庙学的祭祀空间被极大地压缩,只保留主体祭祀空间的小规模庙学在明初辽东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明中期以后,庙学建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建筑的完备和院落的延伸,并逐渐形成了院落空间的封闭和小而多的单元式院落布局等特征。这一时期推动庙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属明中央政府在弘治年间发起的边疆兴学运动以及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兴学运动和大礼议事件的爆发对辽东庙学的教学与祭祀功能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与边疆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庙学的扩建提供了支撑。自正统初年以后,辽东庙学建筑群快速地发展起来。而辽东庙学之所以会产生与中原庙学不同的空间与布局特征,其原因应该与辽东庙学清晰的分段建设模式有关。与中原庙学相比,辽东庙学建筑在营建过程中显然缺少了整体规划的意识,伴随功能的需要各进院落逐渐增加,这种补缺式的建设模式与重新规划、择址重建相比,显然更符合辽东地区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这种组合模式对辽东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形地貌也有着极强的适应性,个别在坡地上营建的城市庙学在这样一种模数化布局的支撑下,能够更好地与地形相契合。最后,院落划分细致导致了院墙的增多,可以有效抵御辽东冬季的寒风,极大地改善了建筑群的内部环境。

清代前期,战争的破坏与满汉文化的差异并未导致刚刚起步的辽东庙学走向衰败,反而继承了明代庙学的发展成果,使得辽东固有的庙学模式延续下来。这一点应归功于早期清政府对汉文化的高度重视。清统治者认为,作为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与教学相比,文化精神层面的继承对于收揽人心、维护统治更具意义。因此,作为中原儒家文化信仰寄托的孔庙及早得到了关注,在政权稳固伊始便陆续开始修复和重建。孔庙的兴建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学宫的建设,并直接促成了清代早期庙学建筑群较高的建筑规模。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庙学建筑群完备的规制成为了清初庙学的建设蓝本。部分保存较好的庙学则干脆直接沿用,如宁远州庙学、辽阳州庙学等;破损严重的庙学则在前朝旧址重建,奉天、锦州两座府级庙学在建立之初,建筑配置均近乎完备,前导、主祭、从祭院落几乎一蹴而就,与同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明初辽东都司庙学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以上两座府学外,辽阳州、铁岭县、海城县、盖平县、开原县、广宁县等地也陆续建立起规制完备的县级庙学。但从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些清代早期营建的庙学,直至咸丰年间,其发展仅仅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以及附属建筑的增设等方面,其空间布局在明中期大规模的增建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直至清代晚期,清廷对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解除为晚清辽东庙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辽东经济的发展与汉族人口的激增极大地推动了辽东地区的城市建设。及至光绪年间,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已由原来的两府增至五府,下辖四厅、六州以及二十六座县城。原来的县制很多升为府制,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县城,而按照规制县城皆可设学。在此社会背景下,各地官员、乡绅均捐建庙学。短短几十年间,北起西丰县,南至绥中县,近20处庙学相继建立,辽东地区庙学建筑群的营建与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1]。这一时期新建的府州级庙学建筑群在空间处理和布局方面趋向中原化。庙学营建一旦摆脱了城市用地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规模宏伟的庙学建筑群自然而然地成为府州一级庙学的首选。另一方面,早期发展起来的庙学建筑群原有的布局模式已经形成,拆毁重建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浪费,继承与创新成为这类庙学的发展方向。在维持孔庙与学宫本身规模不变的前提下,为凸显庙学建筑群的宏伟气势,将文昌宫、魁星楼等城市文运类建筑群与书院建筑群一并纳入到庙学建筑群的营建中来,极大地丰富了庙学建筑布局的空间轴线关系,形成了集祭孔、教学、启运于一体的城市文教类建筑综合体。与前者相比,后者的

营建模式是对辽东庙学营建模式的传承,使沿着自身发展道路延续了六百余年的辽东庙学走向了巅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辽东地区庙学建筑群的空间与布局特征的形成是其边疆城市环境、多民族文化、经济实力和自然条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多方复杂因素的制约下,辽东庙学建筑群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与中原庙学截然不同的空间特征。本文仅从院落空间与平面布局的角度论述了明清两代辽东地区庙学建筑群的特征及其演变。如何在更广阔的空间纬度上,梳理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庙学的发展脉络及各自的独特属性,全面地展现明清地方庙学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及其承载的各地区文化,值得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沈旻. 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M]. 南京:东

南大学出版社,2009.

- [2] 任洛. 辽东志[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85.
- [3] 张士尊. 明代辽东儒学建制研究[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2(1):31-37.
- [4] 中国地方志集成:辽东府县志辑[M]. 南京:凤凰出版社,1985.
- [5] 肖竞,曹珂. 明清地方孔庙建筑布局与礼仪空间营造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2011(2):119-125.
- [6] 辽宁省图书馆. 盛京风物: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代历史图片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7] 黄丽生. 清代边区儒学的发展与特质[J].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5(12):17-55.
- [8] 金沢求也. 满洲写真大观[M]. 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1921.
- [9] 田志馥. 近二十年孔庙研究成果综述[J]. 西华大学学报,2011(4):32-40.
- [10] 黄忠鑫,马桂菊. 明中后期辽北军事地理考论[J]. 博物馆研究,2012(4):46-55.
- [11] 穆彰阿,潘锡恩. 大清一统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The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Temples and School Buildings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ü Haiping¹, CHEN Xing^{1,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Shenyang Urban Construction College, Shenyang 110167, China)

Abstract: As the carrier of Confucius and teaching, the layout of Confucian Temples and School buildings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long-term imprisonment under Confucianism. Because of remoteness,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layout of Confucian Temples and School buildings walks out a different path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fucian Temples and School buildings in this period, the characteristics studies of layout by stag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layout in the two dynasties has gone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the succinct in the initial perio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edium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late stage.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evolu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in Liaodong area.

Key words: Liaodong Confucian Temples and School buildings; characteristics of layout; modularization; causes of the evolution